

石鹏飞文存

演讲实录

石鹏飞 著

云南出版集团
雲南人民出版社



石鹏飞文存

演讲实录

石鹏飞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昆明市文史研究馆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演讲实录 / 石鹏飞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7. 1

(石鹏飞文存)

ISBN 978 - 7 - 222 - 15613 - 5

I. ①演… II. ①石… III. ①社会科学 - 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1806 号

特邀编辑: 朱 原

责任编辑: 王 遒

装帧设计: 陶汝昌

责任校对: 朱 原

责任印制: 杨 立

石鹏飞文存

演讲实录

YANJIANG SHILU

石鹏飞 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 com. cn

E-mail ynrms@sina. com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云南灵彩印务包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222 - 15613 - 5

定 价 28.00 元



云南人民出版社公众微信号

“学术自由”是大学之道的核心 (代序)

“四书”之一的《大学》就谈过“大学之道”，其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其结构是明——明德，第一个“明”是动词，有明白、张大意，“明德”者，善德也，美德也，所谓张大“明德”；“新民”呢，就是更新观念，解放思想；“止于至善”呢，即到“至善”的境界。三句话翻成白话，意为：大学就是更新观念，解放思想，而后明白、张大美德，最后达到至善的境界。

不过，我总以为这是大学追求的目标，至于如何达到，都是“暂付阙如”，语焉未详，还需要探索。

无庸讳言，现代中国的大学是进口的。当年戊戌变法，维新党人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对策就是“废科举，开学堂”。于是就有了“京师大学堂”，后来改名为“北京大学”。

西方的大学制度推行了数百年，且看看他们是怎么提炼“大学之道”的：

早期的西方大学在摆脱了教会的附庸地位以后，逐渐成为学者自治和自足的学术机构。1892年，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生，红衣

主教纽曼的《大学理念》一书，表明了那个时代对大学的代表认识，纽曼称：“大学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神，它描绘出理想的疆域……在那里，对任何一边既不屈服也不侵犯。”

纽曼的大学之道后来演进到德国的洪堡模式和再演进到美国的威斯康星模式，前者强调大学的研究功能，以研究托起教学；后者鼓吹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这样大学就从“象牙塔”走到了“象牙塔”外。当然，大学仍旧坚守“理智的疆域”，仍旧“不屈服任何一边”，至于“不侵犯”云云，恐已不足定义今天的大学。今天的大学早已成了人类的脑库，科技进步的发生器和孵化器，社会进步的动力装置和加速装置，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辐射源，现代文明的轴心。

大学是“理智的疆域”，揭穿了，就是说大学乃“学术自由”的领地。爱因斯坦谈过“学术自由”，他说：“我所理解的学术自由，是一个人有探求真理以及发表和讲授他认为正确的东西的权利”。他还说：“科学进步的先决条件是不受限制地交换一切成果和意见的可能性——在一切脑力劳动领域的言论自由和教学自由”。我想，有了“学术自由”，大学才可能“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大学才可能“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前面谈到，中国的现代大学是进口的，此中，自然有其联系母体血脉的脐带在。讲中国的现代大学史，不能不提到蔡元培先生。1912年，蔡先生以教育总长身份亲自制订的《大学令》，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发育现代大学精神的经典文本。1912年蔡先生赴北大，更是践之履之，奠定了“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中国现代大学之道。蔡先生曾这样诠释“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中的

‘万物相长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器官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蔡先生言行合一，其治下的北大的师资队伍，既有留着辫子的辜鸿铭，也有狂呼“八本书之外皆狗屁”的黄侃，也有新进、前卫的陈独秀、胡适之……春兰秋菊，熙熙攘攘，四时花儿皆不败。讲中国现代大学史还不能不提到梅贻琦先生。西南联大是中国现代大学史中的佼佼者，人才辈出，硕果累累。梅贻琦先生是西南联大三校长里的中坚。梅先生在1940年呈教育部的一文件中称：“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梅先生写过《大学一解》一文，文中称：“所不可不论者，为自由探讨之风气……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而已”。1945年11月5日，梅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对于时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子民的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此昔日北大之为北大，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此时，蔡先生死了，梅先生活着，“学术自由”的理念薪尽火传。

其实，云大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校长熊庆来不亦如此么？1932年，熊庆来下乔木而迁幽谷，从清华来到云大，就以“将云大办成小清华”为己任，自然延伸了清华的风气。熊庆来的麾下，一时俊彦云集。

1949年以来，大学是发展的，接受大学教育的社会层面向以往的“弱势群体”开放，体现了“人权”的提升，做出了卓著的成就。但是，恐怕也有过分强调“个性”而偏离“普世性”的缺失。陈翰笙先生在北大百年校庆期间说：“祝今后的北大办得像以前的北大那么好”，张中行先生去世前谈到：“老北大教人疑，

新北大教人信”，语虽寥寥，却留下了很多的思索空间令人回味。现今中国大陆的大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这里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不反对这个原则。然而，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导”，一要分清“真马”和“假马”，马克思生前就担心：“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海涅的诗句）；二要分清“对马”和“错马”，马的辩证唯物主义所向披靡，不可颠覆，但有些论述也受其身观局限的限制，须与时俱进；三，马是与非马和反马的交锋中成长、发展、丰富、完善的。马克思的老师就不是马。把马克思主义封闭起来，成了暖房里的花朵，就不具免疫力和斗争性，不可能傲视群雄，独领风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应该而且能够接纳人类社会一切先进的思想成果，从而“理论之树常绿”。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必然“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而所谓理论彻底，就是抓住人本身”。故此，我尤其推崇原清华毕业生，后来参加共产党、去了延安，再后来成了清华校长、高教部部长蒋南翔的观点：“假如说辛亥革命之后，我国真有什么值得建树的话，大学教育中的‘学术自由’之深厚传统，应是其中之一”，“一切学术研究，唯应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方能获得最高成就，但同时，我们仍衷心拥护‘学术自由’的口号”（文章发表于1942年5月4日延安的《解放日报》）。什么是共产党的教育家？我看这就是！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大学的“学术自由”注入了活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史无前例的事业，“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学术自由，岂非成了一句空话？在这种语境下，云大也是生机勃勃。于是，有了云大“会泽百家，至公天下”的精神的提出（影响之大，连中科院院长路甬祥也在《新华文摘》改版

时，题写了这八个字）；于是，有了云大“学术兴校”目标的锁定；于是，有了《云大院系关系调整及运行机制研究报告》中以“学术权力为中心”设想的呼吁……凡此种种，显示了云大向普世性现代大学制度和现代大学精神的回归，从而为云大的“乘长风破万里浪”的灿烂前景的实现作了基础性的铺垫。

毛泽东有言：“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历史”。尽管这“自由”云云，系指对对象世界把握后的“从心所欲，不踰距”的自由，是大自由、真自由、最高境界的自由，然而它却是小自由、非真的自由、层次较低的自由碰撞出来的。大自由、真自由、最高境界的自由的获得如果没有“众里寻她千百度”百折千绕、探索试错的艰辛，哪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大开心？

注：

陈翰笙，“中国经济学之父”，北大毕业，系由李大钊介绍入中共，是当时北大最年轻的教授。

张中行，国学大师，北大毕业，后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

目 录

“学术自由”是大学之道的核心（代序）	(1)
从原始生殖崇拜说到现代婚恋观（1993年）	(1)
人生观和人死观（1995年）	(16)
宗教与人生（1994年）	(26)
女人的发现（1997年）	(36)
中国古代文化的价值取向（2011年）	(48)
关于文化	
——兼及“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辨析、	
中国现代文化的内涵（2012年）	(61)
民盟的文化建设（2011年）	(77)
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话说春节（2013年）	(88)
话说老子（2002年）	(94)
老子答问（2015年）	
——在昆八中的演讲	(108)
浅说庄子（2010年）	(113)
魏晋风度（2009年）	(129)

也说“道德”（2012年）	(139)
都市文明与道德建设（2012年）	(151)
“文明”答问	
——答某报记者问（2000年）	(158)
我的“学习之道”（2011年）	(161)
《废都》解读（1994年）	(172)
看电视，说《水浒》（1998年）	(181)
选择与导读	
——在《大学人文精华读本》研修班的演讲（2012年）	
	(189)
经典，好书及阅读（2016年）	(194)
关于格律诗（2000年）	(202)
中国古代诗歌的理论演进和形态演进（2016年）	(214)
说说训诂学（2015年）	(234)
旅游审美（1997年）	(241)
新闻写作ABC与版面语言艺术（2004年）	(253)
社区及其功能（2005年）	(270)
关于“家教”（2011年）	(276)

从原始生殖崇拜说到现代婚恋观

先讲两点：

一，讲婚恋当然离不开“性”。我认为色情不是爱情，但爱情是包含色情的。也就是说色情是基础，爱情是升华。升华不等于阉割。我有个朋友，是著名的性社会学家，刘达临教授。有一次聊天，我说，刘先生你那么斯文，年龄也比我大十来岁，温文尔雅的学者一个，怎么会去研究“性”这个领域？刘先生回答说，我原来是研究婚姻家庭的，结果，研究来研究去发现怎么都避不开“性”，既然如此，“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就跳出去了。

当然也得承认，“谈性色变”，不但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二三十年代西方政府也不准谈“性”。在英国，《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被英国女皇指控为“淫书”；在美国，高校里有人研究性，就被开除教职，视为“流氓”。有人说，当时的《牛津辞典》连“紧身衣”这样的辞汇都不收，因为“紧身衣”让人该凸的地方凸起来，该凹的地方凹进去，挑逗情欲，诱发强奸。当然，后来，西方政府立场有变化，《查特莱夫人的情人》30年后开禁，女皇撤诉，劳伦斯成了世界级的作家，这是英国的变化；美国呢，40年代有《金西性学报告》，名噪一时；50年代玛斯特斯和约翰逊联手推出《人类的性行为》，首版就是30万册……最近我又读到《海特性学报告》，那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正变，性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打破禁区，从性生理到

性心理，性伦理直到性哲学，很多成果也出版了，发表了。性学研究的先驱，我看中国有“北潘南刘”之说，北边是中国人的潘绥铭教授，南边是上海大学的刘达临教授，书出了一大堆。云南呢？若干年前，昆明电台，还叫我去主持过一个两性话题的直播讲座，我讲了“性与服装”、“性与文化”、“古代的性教育”、“性感的定义”、“性爱的功能”等等话题。虽然有风波，可不见镇压。最近读报纸，也有些变化值得注意：如夫妇在家看性带，警察不得干预；譬如安全套进了大学校园；譬如，央视的关于性问题谈话节目，有专家谈到，男女学生谈恋爱，要避免性器官接触，最主要是要避免怀孕……昆明日前还举办了性文化博览会。凡此种种，都说明人类社会在宽容，或者说，今天的人类社会正切切实实地实践着古希腊哲学提出的命题——“认识你自己”。这是文明，这是进步，这是理性与科学的胜利。“以人为本”了，还能回避性么？！

二，讲讲知行关系。知行关系，是哲学的一个命题，有人说知易行难，有人说知难行易，有人说知行合一。我倾向于知易行难。为什么？因为我认为，知是认知上的问题，知只管真假对错；行是个实践上的问题，实践牵扯到善恶。毛泽东说，真理是少数人先发现的，少数人先发现真理到被社会、人类普遍认同，需要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我主张思想不妨先进一点，行为不妨滞后一点。学术无禁区，做人有纪律。我当班主任，我的施政纲领就是可以乱想，准许乱说，不能乱动（这符合宪法，宪法上明言，有思想自由、言说自由、但不说有行动自由）。不准想，不准说，往往阻碍通过真理之门的道路。进一步说，不提“往往阻碍通往真理之门”那么高的程度，不准想，不准说，是连《诗经》的第一首诗《关雎》都没有了，那《关雎》不就是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想老婆想得在床上翻烧饼，最后还是“诗言志”，把它说出来了吗？孙夫子很圣人，可我看这位圣人也很宽容，没有把这首并不表达“主旋律”的诗用扫黄的扫把把它从《诗经》第一首的位置扫出去！他老人家坦坦白白地承认：“我未见好德如好色！”

因为我讲知易行难，自然也不是知行合一，也就是知行不合一。不过知行不合一也要分析，知行不合一，有说好话做坏事的，有说坏话做好事的，我自我评价，大概是属于说坏话做好事的。云大对我的评价多矣，但有一个评价我看中肯，说某某是咬狗不叫，某某是又叫又咬，石鹏飞是叫狗不咬。很谢谢这个评价。叫狗不咬，是不是新旧转型时领先走几步的“出头鸟”的一个特点。你看，胡适之鼓吹“全盘西化”，老婆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化”——裹小脚，无文化，光知道搓麻将，所以胡适之是与“西化”对话，与“中化”睡觉，胡适之死后，蒋中正的挽联称其“新旧道德的模范”。你看，弗洛伊德研究“本我”（里比多），把人定义成“欲望的人形包装，最现代包装”，他认为：“人在死之前，一切都是性的化装表演”，也不见得绯闻不断，倒是行端坐正，做人上令人肃然起敬，我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过这个“背反”的现象。我认为，唯其不咬，才能好好地叫，倘然一咬了，可能叫的权利就被剥夺了。提高来着，这是不是“殉道”？这是不是牺牲？诚如鲁迅先生所说：“肩负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光明的地方去！”

两点声明，其实是个铺垫。铺垫是为了营造出一个好气氛。

下面言归正传，讲讲“从原始崇拜说到现代婚恋观”。

主持人要我讲生殖与婚恋的问题，这实在是大问题。古人说：“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男女居室，

人之大伦也”，因而婚恋和生殖的问题，恐怕是人生问题的一半。我曾说过，一个好的政府无非解决好百姓的吃饭问题，解决好百姓的婚恋和生殖问题（刘少奇建议钢铁厂旁边开纺织厂，以免性压抑），无非是研究人的欲望，满足人的欲望，限制人的不正常的欲望释放自己。有人或许会问，这样，人与动物不就一样了？问得好。恩格斯说：“人是动物变的，所以只能说摆脱兽性的多或少，不能说彻底摆脱了兽性。”恩格斯又说：“一定把人分成灵的人或肉的人，这样的人只能躺在中世纪教会的经典里。”人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天使而已。人要讲文明，可文明又是什么呢？我下过一个定义，不就是“欲望的有序满足”么？对不对？

性（婚恋）的本质是什么

食色，性也。可食只是解决人的个体生存，色却是解决人的群体生存。换句话说，吃饭保我，婚恋保种。从单性到两性，种不是靠克隆而是靠交媾繁衍的。人都要死，就要去生，生，不是性么？生是战胜死的最好武器。儒家的亚圣孟子有句话，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样，人类绝对不能不关注这个问题。

在原始社会，关注这个问题就表现为生殖崇拜。有吃有穿，还不能断子绝孙。我的研究，生殖崇拜表现为三：一，对性器官和性行为的崇拜。如西辽河流域出土我国最早的裸体女神像，被称为中国的维纳斯，就夸张地渲染它的性特征——丰乳肥臀；又如剑川石宝山的“阿盏白”供奉，所谓“阿盏白”就是女阴的模拟物；再如，古墓葬的男根（且）和女阴（环）模拟物等。其二，对性器官和性行为的象征物。如天地，日月，山海，鱼鸟，正三角倒三角，乾（—），坤（--）等等。其三，称谓，如祖

妣，父母，奶奶等。有些学者甚至认为“爸爸”、“妈妈”这些称谓都带有性色彩。还有“棒”字。生殖崇拜还可升华成学派。道家的“道”，就是女阴——人最早的通道。所以道家学派就是阴道学派，道家学说就是女性学说。唯如此，它才讲“谷神不死，谓之玄牝，玄牝之门，谓之天地根”、“万物负阴以抱阳”、“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讲“守雌”而不“竞雄”，讲“以柔弱克刚强”，讲“上善若水”，讲“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为天下先”，阴柔色彩十足。而儒家学派崇“孝”，有说“孝”就是“男根”（周予同说），儒家学说有男性色彩，与道家的呵护女性和小孩不同，孔子明言：“唯女子与小人难养”，这以后就发育出“夫为妻纲”和“父为子纲”，成了大丈夫主义和长老主义。

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即原始人的生殖崇拜往往与生产活动互渗在一起，不仅两种生产一齐抓，而且此生产等于彼生产，融汇不分。春天，不但到土地上下种，而且到配偶身上下种。闹春耕也是交配季。“乃如之人，怀昏姻也”，叫怀春，思春，叫春。有的原始部落，春天到了，耕种之前要祭祀，仪式就是拿长矛向一个长满荆棘的山洞投刺，性意味不言而喻；还有的原始部族，播种前四天禁欲，以养精蓄锐，目的是播种前夜，纵情恣欲，用人的生殖来感应庄稼的生殖；还有的原始民族，把下雨看成是天向地的射精，之后，万物繁茂。我国有一句谚语，“和尚种胡麻，不长”。为什么呢？因为和尚是光棍、单身，“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合而万物生”和尚纯阳无阴，阴阳不合，胡麻怎么生呢??

讲到这里，我回回头，总结一下：性（婚恋）本质是什么，是保种，解决群体生殖，达到人自身的繁衍。所谓“性（婚恋）”实际是上帝所设的一个为了传种接代的甜蜜圈套。曾有人问我：

“生活是什么？”我答：“名词就是最早的定义，生活不就是生活么？！活靠饮食，生靠男女，无活不能生，无生不能活，生活者，饮食男女也，悠悠万事，唯此为大，除此而外，岂有他哉，一切都是从这里升华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唯物主义不就是讲一要活，二要生么！”

性（婚姻）的演变

性（婚恋）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支柱之一。但是性的方式结构并非亘古不变。性早于婚姻，婚姻是人类性爱进入文明阶段的产物。因此现行的一夫一妻制的性结构，不是与生俱来的。

原始人的性是血缘的，氏族内部互相交媾，而且带着乱伦色彩。相传我国人种的祖先伏羲女娲就是一对兄妹，汉画像砖上就有伏羲女娲交尾图。西方也是。希腊神话有一句描写“你在诸神面前拥抱了哥哥”，一些人士大惊失色而痛斥，马克思认为正显出这类人的无知，遂予以批驳。撰写《古代社会》摩尔根写说：“婚姻曾经存在过一种原始状态，那时部落间盛行毫无限制的性关系。因之，每个女性属于每个男性，同样，每个男性也都属于每个女性。”《古代社会》是一本被恩格斯极为称道的著作，这段话就引自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原始人性方式的进步，是先排除乱伦，再排除血缘。这种进步的原因，我看有二：一是乱伦和血缘的性交会导致人种退化，制造出劣质产品，慢慢悟出“同姓相婚，其后不繁”的道理（胡适写过一篇小说叫《结婚》，讲田、陈一对子女欲结婚，父母拼命反对，因为田、陈古为一姓，结婚后不易生出优良子代）。二是原始人认识世界在扩大，走出去，部落与部落开始战争，氏族与氏族开始攻伐，打赢了，男子被杀或变成劳务奴隶，女人呢？

自然成了性奴隶。这就使性从族内走向族外。走向族外，使人类的性开始排除了乱伦和血缘。起点是恶，终点是善，历史就是这样有趣。照婚姻史家的研究，人类早期盛行“劫夺婚”，《易经》有这样记载：“屯如遭如，乘马班（旋）如，非寇，婚媾”，证明了这一点，大概由此而来。中国人把讨老婆称为“娶媳妇”，为什么叫“娶”呢？“娶”字原为“取”，是军事行动，意为“割耳朵”，从军事行为的“取”而演为性行为的“娶”，可以看出其轨迹来。“劫夺婚”的抢老婆，甚至还变成了战争的又一个目的，西方有抢靓妞“海伦”的传说，我国《国语》《左传》也有关于夏桀掠妹喜，纣王得妲己，周幽王载褒姒等记载。“婚”字为什么从“昏”呢，因为黄昏抢亲最合宜。

当然，这时的性虽然排除乱伦与血缘，走向族外，但并不专一。往往是一对兄弟共妻一对姐妹。舜与弟弟象共娶尧之女儿娥皇和女英就是一例。

再朝前走，就到了专婚制。专婚制与以往的群婚界限在哪？我的研究就是“初夜权”的出现。何谓“初夜权”？就是新婚出嫁的初夜，其贞操由全部落的男子或由部落代表头人、巫师来破。这在今天，绝对野蛮，谁愿意吃“漏沟水”呢？我想，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也不肯。但置于历史进程的环节中去看，自然是一种进步，它表示人类从群婚到专婚的过渡，是专婚向群婚的赎身，今夜群婚，以后专婚，以小失换大得，还是划算的。“初夜权”文明化，就是“闹新房”。说它文明了，就是用言语相戏替代了肢体相侵。

问题是人类社会为什么要走向专婚？婚姻既然是男女双方的缔约，我想，这个原因主要还应该从男女双方去寻找？

一，从男子方面去考虑。这最大的考虑是财产继承权。私有